

第二節

為謀和平統一離粵北上

一、北京政變

商團叛亂被平定後，廣東依然陰霾重重，形勢並無根本的好轉。陳炯明仍盤踞東江，虎視眈眈，滇、桂軍對北伐態度消極，而且北伐軍費仍是很大的問題。在孫中山發佈北伐令後，身為大本營財政部長兼軍需總監的廖仲愷曾要求滇、桂等軍核實兵額，交還財權，但均無效，廖仲愷遂被迫辭職。因此，儘管孫中山決定督師北伐，積極地進行部署，但仍然困難重重，舉步維艱。孫中山這時雖然已認識到依靠工農群眾開展革命鬥爭的重要性，但對他說來，具體怎樣去做，還是較生疏的，也還沒有來得及去認真地考慮，而他面對國內戰亂頻仍、百業凋敝的嚴酷現實，早日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願望又特別強烈，就在這時傳來直系將領馮玉祥反戈，在北京發生政變的消息。

原來，當孫中山回師廣州鎮壓商團暴亂的時候，直皖江浙戰爭很快結束，皖系軍閥盧永祥被直系軍閥齊燮元、孫傳芳擊敗，於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二日通電下野，與何豐林等逃亡日本。第二次直奉戰爭於同年九月開始，是奉系軍閥張作霖為回應皖系而發動的。第一次直奉戰爭失

敗後，張作霖撤回東北，苦心經營，以謀再起，同時與浙江盧永祥、廣東孫中山結為同盟，待機共伐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江浙戰爭開始後，張作霖起兵入關，於是在熱河、冀東一帶第二次直奉戰爭正式開始。

戰事初開時，直系軍閥吳佩孚自任總司令，馮玉祥、彭壽莘、王懷慶

分別任三個軍的總司令，於九月十八日發佈討伐張作霖令。正當直奉兩軍在榆關一帶激戰的時候，在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國民黨新的方針、政策影響下，直系軍閥內部發生分化，馮玉祥突然由前線兼程回京，於十月二十三日發動了北京政變，推翻了曹錕、吳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

北京政變是馮玉祥聯絡胡景翼、孫岳（二人均系國民黨員）等人發動的。馮玉祥原是吳佩孚的部屬，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後被北京政府任命為河南督軍，由於駐防洛陽的吳佩孚反對，免去豫督要職，改任有名無實的陸軍檢閱使。當時正值革命統一戰線建立，全國革命形勢高漲，反對曹、吳的呼聲響遍南北，馮玉祥在這種形勢的推動下，開始傾向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於是，馮玉祥與駐喜峰口的直系轄軍第二路司令、陝西軍第一師師長胡景翼，聯



直系將領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邀請孫中山北上和平解決國事。圖為馮玉祥照。

合京畿副司令孫岳，秘密計畫倒戈反曹驅吳。十月十九日，馮玉祥率部隊由古北口回北京，二十三日凌晨到達，立即佔據北京城內城外各重要據點和交通通訊機關，接管北京城防，派兵包圍總統府，軟禁曹錕。北京政變得手後，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米振標（熱河都督）及所屬師長、旅長等，立即聯名通電全國，主張和平停戰，表示同「弄兵好戰，殃吾民而禍吾國者」相周旋。二十四日，曹錕被迫下令：停止戰爭；撤銷討逆軍副總司令等職銜；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改任為青海屯墾督辦。

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直軍士氣一蹶不振。吳佩孚原想以全力對奉作最後一戰，但因未能挽回敗局，乃於十月二十五日在秦皇島通電討馮。此時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古岡顯作通知直軍不得使用秦皇島碼頭，吳佩孚只得將軍隊集中於天津一帶，企圖回救北京，同時電蘇、浙、鄂等省求援。但直軍在北被奉軍張宗昌部所截，幾乎全軍覆滅；在南蘇、浙、鄂直軍齊變元、孫傳芳、肖耀南等部因魯督鄭士琦宣佈武裝中立，不允許直軍過境。此時，閻錫山派兵搶佔石家莊，截斷京漢路交通，湖北、河南直軍不得北上。吳佩孚討馮計畫落空，十一月三日，當奉軍進逼天津時，不得不率殘部自塘沽入海南下，直系軍閥迅速潰敗。國內局勢發生變化。這樣，孫中山揮師北伐的目標——曹錕、吳佩孚，因北京政變已不復存在。

北京政變後，馮玉祥將部隊改稱國民軍，以此表示他擁護孫中山領導的廣州革命政府，並於十月二十五日通電全國：中華民國國民軍會議公舉馮玉祥為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為副司令兼第二軍軍長；孫岳為副司令兼第三軍軍長。三十一日，曹錕等待吳佩孚率軍入

衛的希望破滅，按馮玉祥的意圖成立以馮系為中心臨時內閣後，於十一月二日宣佈下臺。黃郭內閣取代顏惠慶內閣。

北京政變後，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續相溪、劉守中、蒯定煜、凌毅、李石曾、李含芳、嶽維峻、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鄧寶珊等二十九人，聯名電邀孫中山北上指導，共商國是。電報中說：「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無由施展。今幸偕友軍，戡定首都，此後一切建設大計仍希先生指示。萬望速駕北來，俾親教誨是禱！」

對馮玉祥，孫中山並不陌生，據馮玉祥回憶，北京政變之前，他與國民黨人就有來往；孫中山還曾托人將自己撰寫的《建國大綱》贈與馮玉祥。所以，當孫中山接到聯名的邀電後，覺得這不失為一個實現自己和平統一祖國夙願的好機會，便很快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在韶關覆電馮玉祥等人，表示願意北上。當時與孫中山仍存在聯盟關係的張作霖、段祺瑞亦電邀孫中山北上。

孫中山在十月二十七日分別覆馮玉祥、段祺瑞的電中說：「義旗聿舉，大慙肅清。諸兄功在國家，同深慶倖。建設大計亟應決定，擬即日北上，與諸兄晤商。」⁵⁵十月三十日，孫中山回到廣州，在大元帥府召開會議，討論處理北方局勢的具體辦法。一致認為，直系軍閥雖然潰敗，但絕不可因此而以為全國將和平統一，以致動搖北伐的決心和放棄必要的準備。為

此，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向全黨發出通告說：「總理北上，乃應北方各同志之要求，期於北方黨務之進行，有所發展，並非轉與各派求妥協。蓋關於建國北伐之舉，政府既有命令及宣言，並建國大綱二十五條之頒佈；本黨復有北伐目的之宣佈；方針既定，決不遊移，惟當悉力以求貫徹。但目前本黨勢力，尚未充足；掌握政權，貫徹黨綱，尚須有待。凡我同志，當及時努力以宣傳組織，以期團體日固，勢力日充，萬不可以時局小變，致搖素志。尤當隨時留心總理之言論行動，得所師承；並隨時遵依黨令，為主義而奮鬥，毋蹈分歧零亂之習，是為至要。」

孫中山為了實現全國的和平統一，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決定應邀北上。然而，北京的政局，在馮玉祥、張作霖、段祺瑞三方共同支配下，卻充滿矛盾和鬥爭。為揭露段祺瑞政府的陰謀詭計，宣傳孫中山應邀北上的政治目的和革命主張，中國共產黨對當時在北京出現的複雜形勢，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發表了《第四次對時局的主張》，再次明確指出召開國民會議的必要。



為儘早結束軍閥混戰局面，實現國家統一，孫中山決定應邀北上。隨後返回廣州，為北上作準備。圖為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孫中山致馮玉祥應邀北上的電文。

召開國民會議，反映了廣大人民的要求，這是中共在一九二三年七月發表的《第二次對時局的主張》中提出來的，如說：「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商會、工會、農會、學生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只有國民會議才真能代表國民，才能夠制定憲法，才能夠建設新政府統一中國」。就是說，辛亥革命後，孫中山提出以資產階級國會制度代替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並於一九一三年四月在北京正式成立的國會，隨著袁世凱的篡權早已變成了軍閥踐踏民主、統治人民的工具，根本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在北京之國會已成封建軍閥的傀儡，國民否認其代表資格。」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立即得到孫中山的贊同。事實上，孫中山在長期的鬥爭實踐中已經認識到，原來的國會制度已經失去人民的信任，所以他在《北上宣言》中，欣然採納中共的建議，明確提出北上的目的是「召集國民會議謀求中國之統一與建設」。為此，孫中山提出召集國民會議以前，先召集由現代實業團體和反對曹、吳的各軍及政黨、社、團等的代表組成的預備會議，「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選舉方法等」。中國共產黨和孫中山提出的主張，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很快在全國掀起對內要求成立民主共和政權，結束軍閥統治；對外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群眾運動。從一九二四年底開始，正當各系軍閥混戰的時候，上海、南京、廣州、北京、天津等城市人民團體紛紛發表宣言、電報，擁護中國共產黨和孫中山的主張，支持孫中山北上召開國民會議，並分別成立國民會議促成會，參加的人員達幾十萬人之多。孫中山是在國民革命高漲的形勢下起程北上的。

二、抱病北上

為了迅速實現全國的和平統一，同時也為了「拿革命主義去宣傳」，孫中山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毅然決定接受了馮玉祥等人的邀請。他認識到當前「根本之圖，尤在速謀統一，以從事建設。庶幾分崩離析之局，得以收拾；長治久安之策，得以實施」。所以經過「權衡輕重」，決定冒著生命危險，到北京「共籌統一建設之方略」。

此時，孫中山已略感身體不適，但是，為了國家的統一和人民的幸福，他決心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抱病北上，盡個人的最大努力。在決定於北上的次日，他便到黃埔軍校辭別，並發表講話論述北上目的，認為「從前革命，都是在各省，效力很小，要在首都革命，那個效力才大」。並指出北京政變後，政權不是在革命黨之手，還是在一般官僚軍人之手，同時並無革命的跡象。既然如此，自己為什麼還要北上呢？孫中山解釋說，這主要是為了擴大革命的宣傳，將革命的種子傳播到北方，壯大革命的力量，著眼於將來，為「一個大規模的中央革命」做準備。他強調，此行的結果究竟怎樣，尚難預料，但為革命前途發展考慮，仍應北上。這些話，說明孫中山對政變後的北京政局，是有清醒認識的，對這次北上能否實現自己的目的，並不抱盲目樂觀的態度。

鑒於張作霖、段祺瑞等人反復無常、居心叵測，有一些國民黨人擔心孫中山北上的安全，勸他取消此行。但孫中山向來以民族利益為重，早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他既然覺得北上對

革命事業有利，就不管有多大的風險也決定前行。他對周圍的人說：「我這次赴京，明知異常危險，將來能否歸來尚不一定，但我之所以北上，是為革命，是為救國救民而奮鬥，又怕什麼危險呢？」

同時，孫中山並未因決定北上而停止北伐的軍事部署。他指派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譚延闓為北伐聯軍總司令，負責大本營事務，駐守韶關，主持北伐軍事。十一月初，進入江西的北伐軍接連攻佔大庾及贛州，並向吉安推進。

十一月十二日，孫中山出席廣州各界歡送會，發表演說，再次闡述他對北方時局的認識和對這次北上的考慮，表示儘管道路坎坷，他仍決定到北京去，「拿革命主義去宣傳」，推進革命的發展。並勉勵大家「同心協力把廣東的基礎弄得鞏固，做一個革命的好策源地」。

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孫中山偕宋慶齡及隨行人員李烈鈞、邵元沖、黃昌谷、朱和中、馬超俊等二十餘人，乘「永豐」艦離開廣州，踏上了北上的旅途。這時，孫中山有了中國共產黨和廣大革命群眾的支持，革命堅定性進一步加強。在當前局勢問題上，他主張對內趕快召集有各界人民團體、反對曹、吳的各軍及政黨參加的國民會議，結束軍閥統治，解決中國的統一和人民的自由問題；對外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趕走支持封建軍閥的帝國主義，實現中國的民族獨立。這些主張，都是中國共產黨提出而為孫中山接受的。他在北上前，對外國記者談話說：「帝國主義……不僅是我們走向獨立自由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礙，而且是我國的反革命中最強有力的因素。」公開和明確地宣佈了他堅決反帝的立場。離開廣州前三日，他又

以國民黨總理的名義，發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主張，指出：「對外要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使國家獨立自由可保；對內要消滅軍閥勢力，使民治之基礎莫能動搖。」要求「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和建設」。他在宣言的結尾寫道：「本黨於此，敢以熱誠告於國民曰：國民之命運，在於國民之自決，本黨若能得國民之援助，則中國之獨立自由統一諸目的，必能依於奮鬥而完全達到。」這個宣言，表達了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歡迎。

當「永豐」艦於下午三時抵達黃埔時，他再次視察了自己親手創建並寄予無限深情和殷切希望的軍事學校。孫中山到校後巡視一周，並檢閱第一、第二期全體學員實戰演習，然後乘艦赴香港。行前，孫中山對蔣介石說：「余此次赴京，明知其異常危險，將來能否歸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日，孫中山視察黃埔軍校，並作北上前的臨別演說。

來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為革命，是為救國救民而奮鬥，又何危險之可言耶？況余年已五十九歲矣，雖死亦可安心矣！」蔣介石聽罷說：「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孫中山又說：「余蓋有所感而言也。余所提倡之主義，冀能早日實行，今觀黃埔軍校學生，能忍苦耐勞，努力奮鬥如此，必能繼吾之革命事業，必能繼續我之生命，實行我之主義。凡人總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今有學生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業，則可以死矣！」⁵⁶

汪精衛先一日到港。由港改乘日輪「春陽丸」一併起程。

孫中山離開香港經過上海，取道日本到北京。同月十七日途經上海時，帝國主義者出於對孫中山領導革命的仇恨和畏懼，妄圖阻撓他在上海的活動。孫中山到達上海的前一天，英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孫中山由廣州出發至香港，然後轉乘「春陽丸」北上。圖為孫中山、宋慶齡登上「春陽丸」的情景。

國的《字林西報》發表一篇短論，竟然叫嚷：「上海不需要孫中山，應阻止他登岸。」胡說什麼：「孫中山是廣州大本營的大元帥，一舉一動，都負有政治上的任務。上海租界之內，完全是商務性質，負有政治任務的大元帥，住在這樣地方，是不是相宜？」英國的《大陸報》更發出惡毒的叫囂：「要驅逐孫中山出上海」；「絕不要理睬孫中山所提出的廢除不平條約的要求」等等。上海群眾結隊歡迎孫中山時，竟被法租界捕房阻止並捕去指揮者四人。對於帝國主義的這種蠻橫干涉我國內政的卑劣行徑，孫中山立即給予堅決的回擊，指出：「上海為中國之領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住在上海的那些外國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的領土之內，無論幹什麼，客人完全不能干涉。」提出要盡一切力量收回租界，「中國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國僑民在中國領土之飛揚跋扈」。第二天，他在莫里哀路寓所對新聞記者談話中再次指出：「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他說：「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在國民會議席上，第一點就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又說：軍閥與帝國主義「和我們人民的福利，是永遠不能並立的！……我這次往北方去，所主張的辦法，一定是和他們（按：指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利益相衝突，大家可以料得我很危險；但是我為救全國同胞，求和平統一，開國民會議，去冒這種危險」。他宣佈決不與北方軍閥相妥協，要求全國人民做他的後盾。

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孫中山攜宋慶齡等一行乘「上海丸」轉道日本北上。途經日本時，

十一月二十三日，在與長崎新聞記者談話中指出：帝國主義「共管中國之說，是外國人做夢」！中國人民有能力來解決自己國家的一切大事。二十五日，他在神戶東方飯店國民黨歡迎會上的講演中，還列舉了許多具體事實，說明中國革命所以沒有成功，是因為反革命的軍閥力量太大，並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首要條件是打倒帝國主義。他說：「為什麼軍閥有這麼大力量呢？因為軍閥背後，有帝國主義的援助。」；「要中國從此以後，不再發生軍閥，國民能夠自由來解決國事，中國永久是和平統一，根本上便是使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不能活動，便是要消滅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孫中山指出：「革命的力量，無論在古今中外的哪一國，一經發動之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孫中山、宋慶齡在上海寓所接見各界歡迎代表時合影。

後，不走到底，不做成功，都是沒有止境的。」；「要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還是要開國民會議；要開國民會議，還是要靠國民的大家奮鬥，一致去要求。」號召大家支持他北上的革命主張。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與段祺瑞、張作霖的反革命意圖尖銳對立。

孫中山在北上途中，到處受到人民的極大歡迎。在上海碼頭，歡迎的群眾有萬餘人，齊聲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口號，此起彼伏的熱烈的歡呼聲震盪著黃浦江畔。路過日本各地，有成千上萬的愛國華僑和日本人民，鑼鼓喧天地歡迎他。到達天津時，碼頭上迎接的群眾達兩萬人。很多市民自動為他懸燈結彩，燃放鞭炮。在北京的火車站上，參加歡迎的各界群眾有十萬人之多，達到空前的規模。孫中山沒有辜負人民群眾的希望，沿途屢次發表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謀求全國真正統一的重要言論，反復申述必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並堅信中國人民「有能力來解決全國一切大事」。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孫中山在「上海丸」上。

中國共產黨於孫中山北上的同時，在全國發起了一個召集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人民運動，各地區、各階層紛紛成立國民會議促成會組織，積極展開鬥爭，為孫中山北上作後盾。但在孫中山北上途中，北京已成立了以段祺瑞為首的臨時執政府。馮玉祥一派受到排斥，力量薄弱。舊的反動統治去了，新的反動統治又產生了。孫中山即將面臨的對手，仍舊是八年前的那個「謀危民國者」的段祺瑞。本來，段祺瑞和張作霖邀孫中山北上，是企圖利用孫中山來轉移全國人民的鬥爭目標，緩和正在各地展開的國民會議運動，同時也想軟化和收買他，使他參加軍閥集團，做他們的傀儡。現在孫中山沿途宣傳一定要段祺瑞和張作霖服從他的主張，並因此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這是對這些軍閥的陰謀詭計的當頭一擊。這時段祺瑞集團便索性扯下假面目，公然於十二月六日發表致外國使團書，說什麼「外崇國信」，就是要尊重歷史和各帝國主義所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以此獲得主子的歡心，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為了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孫中山的主張，同月二十四日又正式公佈，將召開什麼「善後會議」，來解決國家大事，以此反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日本神戶合影。

對召開國民會議。這個「善後會議」是一個代表軍閥官僚利益的會議，是軍閥官僚進行政治分贓和利益合作的會議，其目的在於抵制國民會議。根據《善後會議條例》，參加會議人員分為四類：「大有勳勞於國家者二人」（指孫中山和黎元洪）；「討伐賄選及制止內亂之軍事領袖」；「各省區及蒙、藏、青海軍事長官」；「有特殊學識、資望、經驗者，由臨時執政聘請或委派之（不超過三十人）」。

這樣，出席這個會議的代表，幾乎都是由段祺瑞政府指派的軍閥、土匪、買辦、土豪、劣紳和他們的狗腿子，連叛徒陳炯明的名字也列上了。人民團體的代表，一個也不能參加。帝國主義豢養的段祺瑞集團的這些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由於多年艱苦的革命工作，孫中山積勞成疾，已患有膽囊腺癌。他這次是帶病北上的。

十二月間到達天津時，段祺瑞政府派了葉恭綽、許世英二人為代表到天津假意迎接，孫中山在病榻上接見了他們。當他得知段祺瑞要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孫中山與宋慶齡在天津合影。

「外崇國信」和召開「善後會議」時，極為憤慨，怒斥了段祺瑞政府的那些屈膝於帝國主義的荒謬主張，並立即對著兩個代表厲聲斥責說：「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麼道理呢！？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為什麼還來歡迎我呢？」在孫中山的凜然正義面前，葉、許二人不敢作聲，好久，才又靦顏地勸孫中山不要太過「激烈」，免得激怒了東交民巷的「洋大人」，引起帝國主義干涉。孫中山氣憤地回答：「假如不打倒帝國主義，我就不革命了！」⁵⁷孫中山的肝癌因此更加惡化了。

一九二四年除夕那天，孫中山帶病到了北京，隨即一再重申了取消不平等條約和謀求國家統一以救中國的意願。

三、國家統一思想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千百年來，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和中國人民意向之所趨，就是反對國家分裂，謀求和維護國家的統一。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程中已具備一種統一的膠合力和凝聚力，是能夠團結一致的。任何其他內外勢力想分裂這個民族，可能在某個時期或某個階段得逞於一時，但最終定是排除分裂，歸於統一。

孫中山的一生中，熱誠地追求中國的統一，竭力反對分裂。他為維護祖國的統一進行了不懈的鬥爭。他謀求和維護國家統一的思想，是其政治思想寶庫中的一個重要部分，迄今仍有現實意義，總結和繼承這一思想有助於推動現代中國的和平統一偉業。

當孫中山踏上民主革命征途時，中國面臨的是帝國主義列強的「瓜分豆剖」、「蠶食鯨吞」的嚴重的局勢。在辛亥革命後，帝國主義各國的矛盾和爭奪，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各自扶植軍閥充當代理人，割據一方，彼此廝殺，戰亂頻繁，中國依舊是四分五裂的局面。反對國家分裂，維護國家的完整統一，成了孫中山進行革命鬥爭的一項首要而迫切的任務。他始終把爭取民族獨立和捍衛祖國統一緊緊聯結在一起，夢寐以求並為之奮鬥不懈的就是國家的獨立、民主和完整統一。

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二四年的二十多年中，孫中山先生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三民主義與中華民族前途》、《臨時大總統宣言書》、《民權主義》、《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平統一宣言》等專文、宣言、講演和書牘裡，依據當時的鬥爭形勢，作過很多次的論述和闡釋。他抨擊「分割」中國領土的妄言，反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明確指出：「支那國土統一已數千年」，「支那民族有統一之形，無分裂之勢」；中華民族是不允許列強「分割此風俗齊一、性質相同」之民族，不允許買辦階級、封建軍閥分裂中國。義正詞嚴地說：「為什麼要把向來統一的國家再來分裂呢？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並嚴厲斥責分裂中國的謬論是「卑劣之言」，痛譴製造分裂中國論調者是「中國之仇敵」。

他針對某些人主張中國要照搬美國聯邦制的謬論，闡明這種聯省「學說」不適用於中國，「不是有利於中國的」，「中國原來既是統一的，便不應把各省再來分開」；並駁斥：「這種見解和思想，真是謬誤到極點！」

近代中國社會的動盪和變化，反映在革命黨成員之思想中也是錯綜複雜的。為防止革命黨內的分歧和分裂，孫中山又提出建立共和政治，把國家導向獨立、民主和統一。他說：「今日中國，正是萬國眈眈虎視的時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爭，四分五裂，豈不是自亡其國？近來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國，兄弟的見解卻是兩樣。外人斷不能瓜分中國，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那就不可救了！」諄諄告誡革命黨人警惕「兄弟鬩於牆」給國家統一造成的危害。

孫中山把是否維護國家統一的問題作為衡量人們愛國與否的一個標準，又把國家統一與否視為人民能否安居樂業的必要條件。他說：「『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他還把政治上的統一和經濟上的富強緊密結合在一起。並反復論證了「統一之時就是治，不統一之時就是亂」的道理，把統一作為富強的前提，強調：「統一成而後一切興革乃有可言。」

對造成中國分裂的根源及國家統一的最大障礙，在孫中山早年是認識不清的，曾對帝國主義存在著不切實際的幻想。但是，經過曲折跌宕，到晚年時，對帝國主義有了深刻的認識，了然帝國主義所扶植的封建軍閥割據就是列強「想用中國人來瓜分中國」，從而明確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是國家不統一的罪魁禍首。在國家統一的思想下，有著鮮明的反帝反封建的特

徵。一九二四年，在《中國內亂之原因》一文中指出：「我們中國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進行，做到徹底成功。這種反革命的力量，就是軍閥。為什麼軍閥有這個大力量呢？因為軍閥背後，有帝國主義的援助。這種力量，向來都沒有人知道要打破，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還不能成功。」他認為，中國內亂的總禍根在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因此，反封建首先必須反帝。中國四分五裂的根源在帝國主義，此一禍根不除，則中國的統一無望。同年，他在上海招待新聞記者時也曾說過同樣的話：「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第一點就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

隨著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阻撓、破壞國家統一認識的加深，提高了對人民力量的認識。在五四運動後，孫中山敏銳地感觸到工農是「新的力量源泉」，逐漸明確了工農大眾為國民革命之主力，轉向同民眾結合，「合成一大力量」來謀求建立統一的新國家了。要達到國家統一的目的，必須和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的聯盟軍作戰，必須和國內民主革命力量，特別是工農力量攜手合作；必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把謀求和維護國家的統一，不僅看做是中國的內政，還看做是中國人民奮鬥的目標，並同反帝鬥爭緊密聯繫了起來。這就把中國人民爭取國家統一的鬥爭納入了世界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的鬥爭範疇之中，這是孫中山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理論的一大貢獻。

這些新思想的發展，是伴隨世界潮流和人民的需要而產生的，體現了歷史發展的必然和

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它的主要觀點，已和中國共產黨人觀察和處理當時國家命運的觀念基本趨於一致，從而成為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思想基礎之一，從一個方面有力地促進了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

孫中山是既有理想抱負，又注重實踐的偉大革命家，為實現國家統一的主張，進行了不懈的艱苦奮鬥。十九世紀九〇年代起，邁開了探索的腳步，屢仆屢起地進行武裝革命，推翻了賣國、專制的清政府，創建了南京臨時政府。他在就臨時大總統職的宣言中，規定對內施政方針是要實行民族、領土、軍政、內政和財政五大統一，要用共和制統一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分裂中國的政治方案。他嚴正地抨擊了當時帝國主義妄圖「割中國為二，限制共和政府於江南」的謬論，堅決抵制列強以「把國家劃分為二」作為外交承認的條件，果斷地駁斥說：「不，那不行。我國人民的情緒是一致的。」他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二二年進行的兩次護法運動，系針對國家四分五裂的局勢，打倒軍閥，削平叛亂，統一中國，實行民主政治。他一再表示，要「竭志盡誠，以救民國，破除障礙，促成統一，鞏固共和基礎」。「中國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別人瓜分自己的國家，他們希望統一，成為一個強大的和不可動搖的民族。」；「我們正在盡力完成賦予我們的這一艱巨的歷史使命。」稍後，他又曾豪邁地宣稱：「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歷史意識之中，正是這種意識，才使我們能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來，儘管它遇到了許多破壞的力量。」

對維護國家統一的途徑，孫中山既致力於革命的武力統一，也從未放棄謀求和平統一中

國的努力。發動武裝鬥爭也是為和平統一創造條件。他深切瞭解「中國人民對連綿不斷的紛爭和內戰早已厭倦，並深惡痛絕。他們堅決要求停止這種紛爭，使中國成為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從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大局出發，他於一九二二年毅然辭去總統職位「為共和」北上，所希圖的是換取和平統一的局面；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他毅然帶病再次北上，仍舊是促進迅速實現全國的統一。

他為祖國的統一，嘔心瀝血，鞠躬盡瘁。

孫中山曾認為：「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是暫時的現象」，最後終歸是要統一的。當前，統一祖國，實現民族團結，乃是人民的企盼，一股不可阻擋的歷史洪流。凡炎黃子孫都應當深思孫中山在世時所揭示的真理，為祖國和平統一和振興中華民族做出積極的貢獻。